

#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

韋伯文選第一卷



甘陽編選

#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

韋伯文選第一卷

甘陽編選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stanbul*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

韋伯文選第 七

甘陽主編/序

甘陽 文 郎 李虹◎譯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 19 586790 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orm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另載權利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複製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ren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計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 韋伯研究再出發

## 韋伯文選第一卷編者前言

甘陽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思想和學術生涯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90年代初韋伯在德國思想界嶄露頭角開始到1897年韋伯精神崩潰止。隨後是整整六年韋伯完全喪失學術工作能力的痛苦時期（1897-1903）。從1903年韋伯發表其第一篇社會科學方法論文章為標誌而重新恢復學術與政治活動開始，是為韋伯學術活動的第二階段，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即為此階段的成果；這一階段大體以1910年韋伯發表「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後反批評」一文告一段落。第三階段則從1910年到1920年韋伯因肺炎瘁死而終，此期韋伯日益轉向對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較宗教研究，同時以極大精力主持「社會經濟學」（Sozialökonomik）研究系列，最後遺留下《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這部未完成的巨著（遺稿以《經濟與社會》這一誤置的書名刊行），以及同樣只完成部分的「比較宗教社會學系列研究」（參本卷「韋伯生平著述年表」）。

《韋伯文選第一卷》的目的是試圖以較小的篇幅反映出韋伯學術第一階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關懷。韋伯在這一階段的論著是以往韋伯研究最忽視，但晚近以來則為學界特別重視的文本。其中韋伯在1895年就任弗萊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時發表的著

名就職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本書第三篇）現在尤其被普遍認為是了解韋伯思想的最重要入手點，我們因此也以這篇著名講演的標題作為《韋伯文選第一卷》的書名。

按理來說，韋伯學術第一階段著作對於韋伯研究的重要性本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韋伯的學術生涯並非遲至他四十歲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1905）時才開始，相反，《新教倫理》本身乃是韋伯將近二十年思想掙扎（其中一度精神崩潰）的結果。事實上韋伯夫人在《韋伯傳》中曾說韋伯思想在二十四歲即他寫博士論文時已定型，以後只是不斷豐富但卻從未重塑。<sup>[2]</sup> 這個話當然不能全信，因為實際上即使到韋伯發表《新教倫理》以至1910年發表「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後反批評」為止，他都還根本沒有提出日後被看成他思想標籤的所謂「西方理性主義」問題，更沒有提出研究非西方文明的必要性；這些問題意識只是在韋伯學術第三階段（1910年後）才逐漸開始發展。<sup>[3]</sup> 但有一點確實是目前學界一致同意的，即韋伯思想從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有著很強的連續性。其中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儘管中間有六年精神崩潰的中斷，但韋伯思考的問題卻似從未打斷過一樣。<sup>[4]</sup> 《韋伯文選第一卷》最後一篇因此特地收入韋伯大病復出後的第一次學術演講，即他訪問美國時所作的學術報告（1904年），以彰顯這一連續性。讀者不難看出，這篇學術報告的主題與韋伯十年前思考的中心問題，即德國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時所面臨的經濟政治文化困境（本書第二篇、第三篇），乃一脈相承。確切地說，韋伯第二階段的重要論著如《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的「客觀性」》，以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事實上是企圖回答他自己第一階段思索中所面臨的諸多困擾。正因為如此，離開了對第一階段著作特別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這篇著名就職演講的了解，我們

事實上將很難理解韋伯為什麼大病復出後要首先花如此大精力不懈地論述所謂「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同樣，他為什麼要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背景也變得全然晦暗不明。而由於這種晦暗不明，韋伯學術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變化也更加費解。例如為什麼韋伯會有所謂「從『資本主義問題』轉向『理性主義問題』」這一轉向？（5）所謂理性主義問題本身又究竟是一個什麼問題？為什麼他要轉向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所有這些事實上都不像以往認為的那麼自明。

晚近以來韋伯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如著名韋伯專家施路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所指出，就在於所謂韋伯的「著述史」（Werkgeschichte）本身成為焦點並成為進一步弄清韋伯思想脈絡的前提。<sup>6</sup>對韋伯第一階段著作從忽視到重視的變化，是與韋伯研究中這一「著述史」的問題日益突出有關的。所謂「著述史問題」說起來本應是任何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亦即我們通常所說，在研究一個作者時不應割裂其文本脈絡而任意抽取某些篇章段落作斷章取義的解釋，而應從作者本人的文本脈絡及其時代背景出發去研究其著作和思想。但在韋伯研究中，以往長期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恰恰就在於相當多的論者並不是從韋伯著作的文本脈絡和韋伯本人的思想歷史脈絡出發，而是以某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出發去解讀韋伯，其結果是許多解釋常常似是而非，不但無法在韋伯的著述本身得到充分印證，而且不乏把韋伯所反對的東西說成是韋伯主張的東西的情況。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於，由於韋伯去世（1920年）後的德國和歐洲一直處在二次大戰前後的惡劣環境下面導致歐洲社會科學發展的停滯，因此韋伯的著作和思想在德國本土和歐洲事實上長期被忽視。例如今天被看成其思想集大成的遺著《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雖然在韋伯去世後不久即由其遺孀以《經濟與社會》為名於1922年出版，但該書到

1947年為止只售出不到二千本。<sup>7</sup> 韋伯在西方社會科學界的影響事實上是首先經歷「美國化」的過程，並在二戰結束後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重新得到德國和歐洲學界重視的。<sup>8</sup> 這一「韋伯美國化」的過程，一方面確立了韋伯被公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科學奠基者的地位，甚至有所謂「誰掌握了對韋伯的解釋權，誰也就有望執學術研究的牛耳」（Who ever controls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ber can entertain hopes of also governing scientific activity）的戲言；但另一方面，正如今日學界一致認為，這種「美國化的韋伯」主要是二戰後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界對韋伯思想的解釋，更多是以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學建構社會學理論系統的需要出發（以帕森斯為代表），而並非從韋伯思想本身的脈絡及其歷史時代的背景性問題出發。也因此，這種「二戰後的美國韋伯」與「一戰前後的德國韋伯」幾乎可以說是道不同而不相謀。

德國學術界可以理解地逐漸羣起糾正這種「美國化的韋伯」。1959年德國歷史學家和韋伯專家蒙森（Wolfgang Mommsen）率先發表影響深遠的《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增訂第二版1974，英文版1984）<sup>9</sup>，第一次把韋伯及其問題意識放到韋伯本身的時代來考察，是為「使韋伯脫美國化」之始。同年另一德國學者滕布魯克（Friedrich Tenbruck）亦發表長文指出韋伯時代所謂「社會科學方法論」與二戰後美國社會科學熱衷的所謂「方法論」實在乃風馬牛不相關的事。<sup>10</sup> 不過在當時，這些著作的影響主要限於德語世界和少數專家。但七十年代中以後，一方面美國本身所謂社會科學「去帕森斯化」的趨勢導致社會科學基本範式（paradigm）發生根本變化，<sup>11</sup> 另一方面則德國學界在「韋伯著述史」的研究進展日益使「一戰前後的德國韋伯」逐漸有取代「二戰後的美國韋伯」之勢。1975年凱斯勒博士（Dirk Kasler）發表了韋

伯著述的詳細編年考證，第一次使韋伯著作的寫作和發表次第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編年史根據。<sup>12</sup> 同年滕布魯克教授發表震撼學界的「韋伯著作的主題統一性問題」一文，<sup>13</sup> 提出《經濟與社會》不是韋伯主要代表作這一驚世駭俗的論點，從而使「韋伯著述史」的問題成為以後任何韋伯研究再無法迴避的問題。1976年聯邦德國成立以蒙森、施路赫特和文克爾曼（Johannes Winckelmann）等五位專家為主編的《韋伯全集》（Max Weber-Gesamtausgabe）編輯委員會，開始計劃系統出版新的「批評－歷史版」韋伯著作。<sup>14</sup> 1984年國際學界在倫敦召開規模盛大的「韋伯與他的同時代人」研討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成是「德國的韋伯」和「一戰前後的韋伯」在韋伯研究中的地位已基本取代「美國韋伯」和「二戰後的韋伯」的標誌。<sup>15</sup> 在這次大會上，德國學者亨尼斯（Wilhelm Hennis）發表的主題報告「韋伯與德國歷史學派政治經濟學」進一步提出「韋伯不是社會學之父」的論點。<sup>16</sup> 其含義當然不是要貶低韋伯的學術成就，而是強調韋伯的問題意識和學術旨趣與今大人們一般所說的社會學實在相去太遠，因此「從現時社會學的角度將不可能使韋伯著作的基礎及基本原則得到歷史的解釋」。使韋伯「脫美國化」由此同時發展為「使韋伯脫社會學化」，即認為要了解韋伯就必須首先研究「社會學以前的韋伯」（Weber before Sociology）特別是韋伯學術第一階段的著作。<sup>17</sup> 1990年在美國著名韋伯專家盧斯（Guerther Roth）等主持下，又有「韋伯的新教倫理：起源、證據與背景」討論會，同樣突出了韋伯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德國背景和時代背景。<sup>18</sup>

總之，晚近二十年來西方韋伯研究的基本傾向是日益強調對韋伯的研究必須從弄清韋伯本人的文本脈絡和思想歷史背景出發，從而表現為「解構美國韋伯，重構德國韋伯」的趨勢，

並由此突出了韋伯思想第一階段在韋伯研究中的重要性。我個人認為這一新的研究取向對於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是有利的，而且具有超出韋伯研究本身的意義。其原因在於「一戰前後的德國韋伯」乃是從當時歐洲一個後起發展國家即德國在這種歷史處境出發來思考問題的，事實上，韋伯全部問題意識都是從當時德國大大落後於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這種焦慮意識出發的。<sup>(19)</sup>「德國韋伯」的這種歷史處境及其焦慮意識，不消說乃與我們中國人至今的歷史處境和問題意識具有更多的相關性。相反，「二戰後的美國韋伯」則以一種發達國家的自鳴得意心態，力圖描繪出一套普遍適用的所謂「現代化理論」，這與身處落後國家境遇的「德國韋伯」的心態是格格不入的。韋伯終其一生根本反對有任何「普遍歷史規律」，根本反對把社會理論系統化的努力，認為「一種系統化的文化社會科學這一觀念本身就不知所云」。<sup>(20)</sup>因為這種追求系統化、普遍化的企圖，在韋伯看來，只可能落入「黑格爾式泛理性主義」（Hegelian panlogism）甚至「自然主義式的一元論」（naturalistic monism）<sup>(21)</sup>。晚近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特別批判韋伯落入「文化主義」即特殊主義，而未能提升到普遍主義的高度，並以超越韋伯的文化特殊主義而論證人類理性發展的普遍性為自我期許。<sup>(22)</sup>雄心壯志誠然可嘉，但我卻不能不懷疑哈貝馬斯究竟是超越了韋伯還是根本就還沒有達到韋伯的視野！晚近以來學界已常常指出韋伯以後的西方社會理論導致「具體歷史之維在現代社會理論中的黯然失色」（the Eclipse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al Theory）<sup>(23)</sup>。今天應該是更注重「具體歷史之維」的時候了。

中國兩岸三地學術界對韋伯學術的興趣由來已久。十年前我們在北京創辦大型學術文庫「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時組

譯的第一本著作就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全譯本（于曉、陳維綱等譯，甘陽、蘇國勛校。北京三聯書店1986第一版）。這本《韋伯文選》則是我出國後在諸多朋友的敦促和支持下勉力所為，然因時間精力之有限，前後拖延幾達三年之久。惟願它對中文學界的韋伯研究尚不無小補。

甘陽

一九九七年三月

於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 
- [1] 有些學者如 Keith Tribe 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韋伯第二階段的終點和第三階段的起點。這種分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似乎過分強調了外部政治環境對韋伯的影響，而未能充分注意韋伯思想發展仍有其內在理路，因此本文不採此說。相反，以1910年左右作為劃分韋伯學術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根據是，韋伯此後日益轉向東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參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第一章、第十二和第十三章；以及施路赫特 *Paradoxes of Modernity: Culture and Conduct in the Theory of Max Web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06ff. Tribe 的劃分見其 *Prussian Agriculture-German Politics: Max Weber 1892-1897, Economy and Society* 12 (1983) : 181-226.
- [2] Marianne Weber, 1926, *Max Weber. A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Transaction Books, 1988) : 85.
- [3]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ch.12
- [4] 可特別參見 *Reading Weber*, edited by K. Tribe (Routledge, 1989) .
- [5] Schluchter,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9.
- [6] 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411.
- [7] 參 Bendix and Roth, *Scholarship and Partisanship. Essays on Max Weber* (Berkeley 1971) : 43。關於該書在二戰前影響很有限這一點亦參 Dirk Ka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Chicago 1988) : 206ff. 以及 Gerd Schroeter, *Max Weber as Outsider: His Norminal Influence on Germ Sociology in the Twenties*,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ural Sciences* 16 (1980) : 317-332.
- [8] 關於韋伯在美國被帕森斯等塑造成為「社會學家」的過程以及這一「社會學家韋伯」內銷回戰後德國的過程，參 Tribe 為亨尼斯《重建韋伯》英譯本寫的「譯者導言」。W. Henms, *Max Weber: Essays in Reconstruction*,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London: Allen & Unwin, 1988) 關於韋伯「美國

- 化、過程的分歧。參 Roth, Max Weber: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6, 1977: 91-118. 亦參 Irving Louis Horowitz, Weber and the Spirit of America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64, pp. 344-54.
- 9) Wolfgang I. Mommsen,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20*. Translated by Michaels Steinber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 10) Tenbruck, Die Genesis der Methodologie Max Weber, *Ko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XI, 1959: 573-630.
- 11) 參 Jere Cohen et al, De-Parsonizing Weber: A Critique of Parsons' Interpretation of Weber's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1975) : 229-41. Cohen et al. On the Divergence of Weber and Durkheim: A Critique of Parsons' Convergence 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1975) : 417-27. David Zaret, From Weber to Parsons and Schutz: the Eclipse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980) : 3: 1180-1201. 亦參 Robert W. Friedrichs,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70) .
- 12) Dirk Kasler, Max Weber-Bibliographie, *Ko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27 (1975) : 703-730. also, Kasler, *Max Web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Translated by Philippa Hur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originally 1979) , esp., pp. 242-275.
- 13) 「卓伯著作的主題統一性問題」這個標題是滕布魯克本人將此文譯為英文時的標題，該文最初以德文發表時題為「卓伯的著作」。參 Friedrich H. Tenbruck, Das Werk Max Weber, *Ko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27 (1975) : 663-702. 英譯見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1980) : 313-51. 英語學界對有關討論的最早反應參 Stephen Kalberg, The Search for Thematic Orientations in a Fragmented Oeuvre: The Discussion of Max Weber in Recent German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Sociology* 13 (1979) : 127-139.
- 14) 根據1981年由施路赫特執筆，以編委會名義發行的《卓伯全集說明書》(Prospect der Max Weber Gesamtausgabe, Mohr 1981) ,《全集》將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著作與演講」十八卷(1984年增為二十二卷，其中有些卷含若干分冊)；第二部分「通信」八卷；第三部分「手稿與講課筆記」兩卷。《全集》最初兩卷出版於1984年，分別為第一部分的第三卷和第十五卷。
- 15) 會議論文出版為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edited by W. J. Mommsen (London, 1987) .
- 16) W. Hennis, A Science of Man: Max Weber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edited by W. J. Mommsen (London, 1987) : 255-8. 並參 W. Hennis, *Max Weber: Essays in Reconstruction*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London: Allen & Unwin, 1988) .
- 17) L. Scaff, Weber before Weberian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5 (1984) : 190-215. Tribe, Prussian Agriculture-German Politics: Max Weber 1892-1897, *Economy and Society* 12 (1983) : 181-226. Martin Riesebrodt, From Patriarchalism to Capitalism: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Max Weber's Agrarian Studies (1892-93), *Economy and Society* 15 (1986) : 476-502.
- 18) 會議論文出版為 H. Lehmann and Guertner Roth, eds.,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s* (Cambridge, 1995) . 並參 Marshall, Gordon, In

- Search of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 Essay on Max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 [ 19 ] H. Liebersohn, *Fate and Utopia in German Sociology, 1870-1923* (The MIT Press, 1988) . Giddens, *Politic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h.1.
- [ 20 ]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edited by E. Shils (The Free Press, 1949) , 84; also see 56-57, 72-75; 80-81.
- [ 21 ] 同 [ 1 ] : 86.
- [ 22 ]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2 volumes (Beacon Press, 1984, 1987) , vol. 1, esp. pp. 157-85.
- [ 23 ] David Zaret, From Weber to Parsons and Schutz: the Eclipse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980) , 3: 1180-1201. 亦參 Robert W. Friedrichs,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70) .

# 韋伯生平著述年表

甘陽 編

- 1864 4月21日生於埃爾福特
- 1867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
- 1871 德國統一，是為德意志第一帝國，以俾斯麥為首相
- 1872 尼采《悲劇的誕生》出版
- 1882 入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
- 1883 在斯特拉斯堡服役一年
- 1883 奧地利經濟學派代表孟格爾發表《探索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德國歷史經濟學派代表許默勒對該書發表尖銳抨擊，從而引發影響深遠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之爭」(Methodenstreit)；同年德國哲學家狄爾泰亦出版《社會人文科學引論》而被許默勒引為真正奠定社會科學方法論基礎
- 1884 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
- 1885 《資本論》第二卷出版，恩格斯作序再度挑起價值理論之爭，成為「方法論之爭」另一戰場
- 1887 尼采《道德的譜系》出版
- 1889 通過博士論文《中世紀貿易公司的歷史》
- 1890 俾斯麥下台
- 1891 完成並出版講師資格論文《羅馬農業制度的歷史對羅馬公法與私法的重要性》，開始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
- 1892 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受「社會政策研究會」委托分析德國東部農業社會結構變遷及其對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以此為基礎發表多篇文章開始其對德國政治經濟轉型的具體分析
- 1893 與瑪麗安娜結婚

## 韋伯生平著述年表

- 1894 《資本論》第三卷出版，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開始進入德國學術界並強烈影響韋伯和宋巴特等德國年輕一代社會科學家
- 1894 放棄名校柏林大學法學教授機會，反接受當時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學弗萊堡大學聘請出任經濟學教授，這一選擇本身反映了法學在歐洲學術的傳統崇高地位已經下降，經濟學成為領頭學科
- 1895 5月在弗萊堡大學發表著名的經濟學教授就職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明確闡明自己對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及其與政治的關係的看法，強調「經濟科學是一門政治科學」，預示了日後關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的一系列基本思考
- 1896 發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  
轉任海德堡大學政治科學教授
- 1897 發表「古典西方農業社會狀況」；  
與父親激烈爭吵，不久後父親去世
- 1897-1903 精神崩潰，被迫停止一切教學、研究與政治活動
- 1902 宋巴特出版《現代資本主義》
- 1902 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李凱爾特發表《自然科學概念形成的界限》，韋伯認為此書為他提供了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爭的哲學和邏輯基礎
- 1903 重返學術活動，完成並發表第一篇「方法論著作」：「斐歇爾的『歷史方法』」；動手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部分
- 1904 8月-10月訪問美國並發表病後第一次公開演講「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出任《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雜誌主編，撰寫著名的「新發刊詞」即「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客觀性』」（第二篇方法論論文）11月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部分
- 1905 俄國二月革命

- 1905 自學俄文以研究俄國革命進展，6月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二部分，發表第一篇方法論論著「克尼斯與非理性的問題（上）」
- 1906 尼采《權力意志》出版
- 1906 發表第四篇方法論著作「克尼斯與非理性的問題（下）」；發表第五篇方法論著作「文化科學的邏輯之批判研究」；發表「論俄國憲政民主的處境」；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年度大會
- 1907 發表第六篇方法論著作《批判斯旦慕勒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駁斥」》
- 1909 將舊文「古典西方農業社會狀況」擴展為長篇專著出版；出任「社會經濟學大系」主編，擬定卷次目錄，將自己承擔的部分題為「經濟與社會」，最初計劃的結構如下：1、經濟與法律；2、經濟與社會羣體（家庭與社羣，身份團體與階級，國家）；3、經濟與文化
- 1910 參與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發表「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最後反批評」，從而將圍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爭論告一段落，開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
- 1912 由「為什麼只有西方有和聲音樂」這一問題觸發，第一次開始考慮更一般的「為什麼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種獨特的理性主義」這一支配其後期學術思考的中心問題，開始走向西方與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較研究
- 1913 發表「論解釋的社會學的若干範疇」；因社會學方法論之爭退出德國社會學會
- 1914 修訂「社會經濟學大系」的編輯計劃，大大擴展自己承擔的部分並將之題為「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調整後的計劃如下：  
「經濟、諸社會領域及權力」

第一章：諸社會領域的範疇；經濟與法律的基本關係；經濟組織關係一般；